

宝庆讲寺丛书

中国佛教学者文集

朗宇法师 主编

佛教因明论

刚晓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宝庆讲寺丛书

中国佛教学者文集

主编 朗宇法师

副主编 圣凯 道坚 黄夏年



佛教因明论

刚晓 著

◎ 宗教文化出版社

寶慶講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教因明论/刚晓 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宝庆讲寺丛书·中国佛教学者文集/朗宇法师主编)

ISBN 978-7-80123-843-6

I. 佛… II. 刚… III. 佛教-文集 IV. B94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023723 号

佛教因明论

刚 晓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0(编辑部)

策划组稿: 黄夏年

责任编辑: 戴晨京

版式设计: 陶 静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5 印张 270 千字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978-7-80123-843-6

定 价: 32.00 元

总 序

从佛法本身来说,教、理、行、证的修学次第,已经为佛弟子指明了修学的道路。但是,佛弟子因为自己的资质、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于是形成不同类型的佛法,有重义理、重实践等区别。但是,作为佛弟子来说,义理的探讨是为了将佛陀所要开示的真实事理,充分、完整地表达出来,如“阿毗达磨”虽然着重于论证“法”的自性、定义、关系等,但是其本意仍然在于“谛理的现观”,最终归于修证。那么,重修证的佛教,主要是从利益众生的角度,重视佛法的适应性、实效性,所以对事相的分别比较少,如初期大乘经典以“般若”、“三昧”、“解脱门”、“陀罗尼”、“菩提心”等作为中心,来表达从发趣、修行、证入的历程。虽然存在着种种不同的侧重,但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以义理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中心。中国佛教其实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如天台智者大师的教观并重,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高僧传》将古代僧人分为十科,其中翻译、解义、读诵便属于义解门;而习禅、





明律、感通、遗身、护法、兴福，都是属于实践门；最后一科“杂科”则是指出家人的外学修养，旁及世间经书、治世语言、礼乐文章等，无不兼通。

但是，传统意义的佛教义解，主要是注疏经、律、论，在“述而不作”中表达自己的理解与观点，当然也有一些专门性的著作。而且，这些佛教义解僧，都是从自己的信仰与经验出发，通过注疏、论著，来达到实践与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兴盛、隋唐佛教的辉煌，都与义解的繁荣是分不开的。而禅宗的发展则为中国佛教注入新的生命，重视主体的体认、自己身心的解脱、净土法门的流行，激发了信仰佛教的感情，为佛教走入社会提供了方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禅、净的流行，在这种“简单”、“不立文字”的潮流下，中国佛教徒逐渐失去探讨高深佛理、考察繁琐戒律的兴趣。于是，中国佛教重视义理研究的优良传统便丧失殆尽。

另一方面，佛学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却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应该是开始于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殖民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必须要深入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于是，通过接触梵文、巴利文等东方语言，开始了解佛教的理论，消化佛教的教义。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这些学者注重现代佛学研究的客

观性、纯学术性,形成了佛学研究的现代传统,于是佛教便成为一种学问——佛学。19世纪后期,日本佛教界开始运用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从而推动了日本佛学研究的兴盛与发达。随着“西学东渐”、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增强,中国开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这在当时中国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与回应,如《大乘起信论》、《楞严经》的辨伪,“大乘佛教非佛说”的讨论,“佛教非宗教非哲学”之辩等。同时,佛教界受时代流行的学术方法的影响,尤其是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人生佛教”运动,佛教理性主义思想的高扬都直接推动了佛教界从事佛学研究,其中以印顺法师的成就最大。但是,相对来说,学术界则在佛学研究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像吕澂、陈垣、汤用彤等,皆为一代学术大师。



总
序

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复寺院、重塑佛像的工作,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香火旺盛的现象。于是,培养人才、弘法、学术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然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各方面人才的紧缺无形中遏制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而人才的成长与培养,这又与佛教界的观念与重视程度是成正比的。

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



气的影响,文献学、考据学、思想史、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对佛教进行理性地分析,定性定量,促使了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等领域,扩大了佛教的知识面,更凸显了佛教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显示其优胜之处。通过学术研究,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提高了人们对佛法的正确认识。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同时,他们作为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圆融转化佛教的思想,向社会表达佛教的看法,这些都是有益于社会与众生的活动。

因此,佛教学术研究的根本意义,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时空中的佛教发展形态,而且更是从现存的文献、文物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探索其前后延续,彼此关联的因果性;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佛法的本质,及其因时、因地的适应。以了解过去,承受根本的佛法特质,作为我们信行的基础,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代表大会便提出要契理契机地弘扬“人间佛教”思想,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以“以文化阐扬佛法,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契理契机地以文化阐扬佛法是实现佛教中国化、本土化、现代化的权巧方便。”现代中国佛教界,应该认真地认识学者们的新观点,吸收其中的有用之处,通过转化与变通,仍然能够落实到佛法的信仰与实践,佛教才具有更大的潜力。

宁波宝庆寺始建于北宋端拱二年(989),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嘉定十五年(1222)宋宁宗赐名“宝庆讲寺”。寺里历代住持及僧众均有重视义理、尊重学术、礼待学人的优良传统,一直讲法不辍。曾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性启蒙教材《三字经》的作者王应麟曾为宝庆寺撰写了《宝庆讲寺记》。大儒黄震为寺里撰写了《宝庆寺观音殿记》。此二文的碑刻至今仍然保存完好,高高地耸立在寺里。现在宝庆全寺僧众十分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在日常事务、早晚功课、坐禅念佛等之外,勤于读书,研究经论。我本人自从出家以来,参访名山大寺,受到多位高僧大德善知识的指点,喜欢研读经论及现代学者的研究著作。因此无论到哪里,我都会带上一些书,也经常 would 到各地的书店去逛逛,看到佛教书籍经过十多年的出版,已经蔚为大观,感到欣慰。但是,对于社会的需求和佛教文化的发展,目前出版的书籍远远无法满足人们对佛法的需求,而且现有书籍之中,难免良莠不齐,精品佛教图书仍然少





见。有感于此,我和道坚法师、圣凯法师、黄夏年先生进行一些交流,得到他们的赞同与支持。于是,我们决定以本寺的名义出版一套丛书,希望能够推进佛学研究的发展,让佛法能够深入社会人心,达到净化人生的效果。

朗 宇

2004年6月21日于宁波宝庆讲寺

序

按理,刚晓法师是不该请我作序的,我也不是为其文集作序的合适人选。

要知道,刚晓法师作为出家人,其研习因明进而著书立说,充满了宗教悲情。他本人一再声明其因明研究不涉及与逻辑的比较研究,自己也不熟悉逻辑。我恰恰又以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作为立论之本。想不到他居然会找我,而我竟然也会慨然应诺。我是丢下手头急于完成的任务而不顾,读起了他的文稿。



序

我很愿意为他的文集作序,原因在于他的特殊身份和特殊贡献。

唐代玄奘所传的因明是印度陈那的新因明,构成了汉传因明的主体。刚晓法师主要研究陈那因明。陈那因明是辩论术、逻辑和量论的结合体。前期以立破为中心,大量内容与逻辑的推理相关,与推理的应用即论证相关。陈那因明是佛教的论辩逻辑学说,论辩的内容涉及印度各宗各派的哲学、宗教思想。前期代表作是《因明正理门论》,量论即认识论内容较为简



略。陈那后期代表作《集量论》则完全以其前期创建的立破学说为基础,建立集大成的量论学说。

从1896年窥基《因明大疏》回归中土之后,因明在近代复苏。在1919年至1949年三十年间(因明研究现代时期),在佛教居士、法师、佛教哲学家、语言学家、逻辑学家的共同参与下,因明研究在汉地出现自唐以来的第二次高潮。突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相关佛教和其他外宗思想体系的基本概念、哲学思想、宗教思想的阐发,二是运用准确的逻辑知识正确地阐明因明的概念和体系。前者以吕澂和熊十力为代表,后者由陈大齐(上世纪30年代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独占鳌头。他们各领风骚,形成互补。正由于这两个方面的贡献,使现代的因明研究延续了唐代正脉,达到了新的高度。其代表作有吕澂的《因明纲要》等、熊十力的《因明大疏删注》和陈大齐的《因明大疏蠡测》。

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就会发现刚晓法师因明研究的成就不同凡响。首先,在佛门中他是当代在因明领域唯一的著书立说者。其次,他不仅能讲解《因明入正理论》,还能讲解《因明正理门论》,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是迄今为止能借助吕澂、法尊、韩镜清译本完整讲解《集量论》的唯一专家。第三,他推进了量论的研究。

在上世纪 50 - 70 年代,吕澂和陈大齐两位先生又各自发挥专长,撰写了重要论著。中国逻辑史学会的学者们从 70 年代起在因明与逻辑的比较研究中取得丰硕成果,然而对于量论的研究除了看到虞愚、宋立道先生有所涉及外,几乎无人问津。要推进因明研究,必须使立破学说和量论学说两方面研究比翼齐飞。由于从事逻辑研究的学者们对佛学名相概念的理解有先天不足之憾,普遍都较为生疏。就连逻辑学家陈大齐教授在 70 年代出版的《因明入正理论悟他门浅释》中,干脆对二量部分略而不谈。这既是出于学问家的坦诚,也是出于无奈。作为佛门中人,刚晓法师在其论著中对佛学名相、因明术语特别是量论术语的讲解就显得游刃有余。他对量论的研究颇有心得。唐代窥基和续疏者慧沼在《因明大疏》中把似现量、似比量归为非量。刚晓法师则依照吕澂先生“宗论而简疏”的原则,详考《入论》、《理门论》和《集量论》。根据《集量论》关于非量是不确定的量的观点,判定似现量、似比量虽为错误的量,但不属于非量,因为它们是的量。

读刚晓法师的文集,有一深刻的印象,他是学术讨论中一位难得的诤友。每遇疑难,必深入经藏,探幽发微,常有独立的见解,而且勇于发表,敢于与古往今来的高僧大德、名家权威商讨。其刚其晓,可钦可





佩。

有个建议提出来,希望共勉。研究佛教量论的与从事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的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释迦牟尼佛有很敏捷的逻辑思维能力。一个叫长爪的游行者对佛说:“一切于我皆不可。”佛陀平静地对他说:“那你对自己的观点‘一切于我皆不可’是否认可?”这一问,便把对方问住了。长爪的观点是不完全的“悖论”。唐代高僧神泰对此“半悖论”的解释有一半是错的,其原因就在于他不懂得从全称否定判断推不出全称肯定判断的逻辑道理。陈大齐先生对许多因明概念的精当诠释,使后习者少走多少弯路!陈大齐先生的因明成就主要得益于深厚的逻辑修养。刚晓法师倘能谙熟逻辑,文集中涉及因明与逻辑的见解当能更上层楼。

郑伟宏

目 录

总 序	朗 宇(1)
序	郑伟宏(7)



目
录

· 第一篇 ·

玄奘真唯识量	(2)
真唯识量古疏释	(15)
《宗镜录》三量说	(49)
藕益因明得与失	(75)
因明支分	(104)
同、异品定义中为何没有“除宗有法”	(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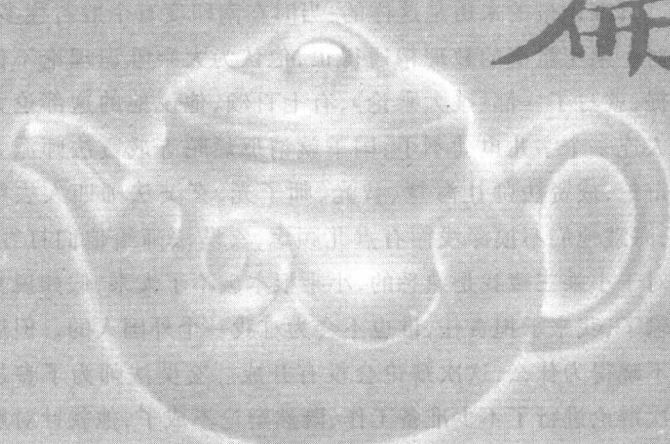


喻支俱不成过	(136)
因明共许	(153)
现量观的变迁	(172)
《集量论》选析	(200)
附:《集量论》赏析	(211)
《汉传因明二论》中的一个错误	(220)
关于数论派的一个说法	(223)

· 第二篇 ·

因明开展	(228)
佛为定量	(302)
佛教现量说	(313)
为自比量	(329)
为他比量	(366)

第一篇





玄奘真唯识量

玄奘法师在印度将要回来的时候，戒日王给开了一次无遮大会。窥基法师《因明大疏》中说玄奘法师在这次无遮大会上公布了“唯识比量”，唯识比量就是真唯识量。

2

真唯识量的来历是这样的：当时在南印度有个般若菴多，他对小乘正量部的教理精通得很，他认为大乘唯识理论不值一提，就写了一部《破大乘论》，有七百颂，他说他的这部论大乘人连一个字儿也动不了，国王就请那烂陀寺戒贤法师派人来辩论，戒贤法师让海慧、智光、师子光、玄奘法师四人去辩论，海慧他们不摸深浅而有点儿顾虑，玄奘法师给他们打气，说对于小乘三藏我是熟悉的，小乘根本破不了大乘，假如说真的输了，我来承担责任，谁也不会为难我一个外国人的。但后来不晓得为什么，这次辩论会没有开成。玄奘法师为了参加这次辩论进行了不少准备工作，既然辩论不成了，他就针对般若菴多的《破大乘论》写了一篇《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这个论在那烂陀寺得到一致称赞，后来戒日王知道了这部论，就把这部论要去看看，他看后很高兴，说，“日光既出，则萤烛夺明，